

汶川经验：对口支援与脆弱性/恢复力¹

张 曦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脆弱性（Vulnerability）与恢复力（Resilience）是现行灾害研究中常用的一对关键性概念。这对概念都源自自然科学应对灾害及风险的研究，其后也被引入了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汶川大地震后灾后重建的中国的对口支援模式的成功经验在相当的程度上颠覆了这对概念，就某种意义而言，政策性、计划性的跨地域的资源、资金、技术的流动也是人类社会应对灾后重建的重要经验。

【关键词】：对口支援；汶川大地震；脆弱性；恢复力

【中图分类号】：X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18）04-0104-07

2008年发生的“汶川5.12大地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自“唐山大地震”以来的又一次强度及规模都极大的自然灾害，地震给北川羌族自治县、汶川县、都江堰等共10个县（市）带来了巨大的人员、财产损失，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同样也引起了灾害研究学者们的关心。灾后不久，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灾害社会学研究者浦野正树在“在中国四川大地震中呈现出的脆弱性——自然灾害描画出的课题”一文中及时表达了自己的关注之情。浦野文章的题目中非常明确地使用了“社会脆弱性”（social vulnerability）一词，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将汶川地震与2008年5月2-3日在缅甸发生的横扫5个省邦，造成8.45万人丧生、5.38万人失踪、1.94万人受伤、总计735万人受灾的强热带风暴“纳尔吉斯”（Cyclone Nargis）相提并论。特别强调了缅甸的“社会脆弱性”，如专制独裁的军政府体制、封闭的社会、人民的被压迫等等，由于这些“脆弱性”原因使得受灾者几乎得不到需要的援助，反而增加了困穷度。而对于中国地震灾区则称灾区存在着诸如二次灾害的危险、耐震性极差的校舍倒塌引发的学生们的受害、上游化工厂的爆炸传闻、水源污染、堰塞湖、水库裂缝、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等等社会脆弱性，因此救灾及重建都是不乐观的。浦野文章中将汶川地震灾区直接嫁接到“社会脆弱性”上，甚至与缅甸案例做类比值得商榷，而在浦野正树的文章以后，中国在灾后重建中的精彩表现使得全世界都为之瞩目的。

一、脆弱性及其理解

加拿大约克大学的提莫曼（Peter Timmerman）在1981年提出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与恢复力（resilience）一对概念来理解灾害对于社会的影响。^①从其引文中可以知道这对概念其实在1979年世界气象组织WMO（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的文件中就以“specially vulnerability”与“specially resilient”的形式出现过。WMO在Supporting Documents中认为“需确定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人类社会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得他们在气候可变性和变化面前，或者特别脆弱、或者特别适应。”^②

¹【作者简介】：张曦，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东京大学人类学博士。

²①Peter. Timmerman. “Vulnerability, Resilience and the Collapse of Society: A Review of Models and Possible Climatic Applications.” Environmental Monograph No. 1. 1981. P. 3.

②WMO.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Variability on Society” World Climate Conference A Conference of Experts on Climate and Mankind Declaration and Supporting Documents. Geneva, February 1979. P. 37.

提莫曼虽然对脆弱性及恢复力的具体内容语焉不详，但从他所强调的三点诸如危机时期的重要性、社会与生态模式的混合、以及成为未来研究指导原则，可以看到脆弱性与恢复力是广泛的系统性的存在。就此意义而言，脆弱性与恢复力相当于一体两面，即脆弱性是自然体系、社会体系抗御灾害、风险的某种程度，而此程度又是由自然体系、社会体系的恢复力来决定的，也由此可知脆弱性与恢复力是作为组合概念出现的。同样在 1981 年意大利国际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委员会委员佩兰达也将灾害与社会体系脆弱性结合起来探讨灾害研究的问题，并直接将灾害定义为“社会体系脆弱性的现实化”（actualization of the sociosystemic vulnerability），佩兰达还设置了三个基准：类型性的（typological）、特定的（specific）、一般的（general）来加以说明。^①

由上述可知，西方社会科学学界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将“脆弱性”这样的表述引入灾害研究中，尽管没有使用“Vulnerability”这样的表述，但是美国灾害研究者卡利在其《灾害与发展》一书中说：“灾害较其现象自身而言，更是一种社会共同体应对突发在社会·经济体系以及自然构造上的事件的能力的功用”^②，卡利是基于发展理论的灾害定位，其成书时期正好是参与式发展理论开始流行的时代。其实更早在 1979 年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托里已经将自然灾害与经济发展关联起来。托里认为不断地面临灾难的印度的殖民行政的变形就说明了灾害与发展的关系，即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地方、国家的组织应对灾难的变形最终会刺激到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诸多单一性将有必要首先分离出重要因素，从而建构出灾害-发展的同一性”。托里在文章中也使用了“disaster Vulnerability”一词，并以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视角呈现出了第三世界中农村社会中不可避免的经济剥削。^③美国南卡罗丽娜大学灾害研究室的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曾经解读过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研究灾害的论文，并从中总结出了灾害研究中脆弱性的三种形态：1. 作为既存的条件脆弱性（vulnerability as pre-existing condition）；2. 作为调适反应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 as tempered response）；3. 作为特定地点灾害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 as Hazard of place）。^④这三种脆弱性的析出，使得脆弱性能够更为准确地、更为广泛地适用于人类社会。如图 1 所示，能够减少人类、人类社会的自然、人为灾害中的暴露面积，从而完成减灾、或者防灾。



图 1 脆弱性的缩减

2015 年台湾学者林冠慧、张长义撰长文介绍了脆弱性研究的演变历史并展望了今后的理论发展。林张在卡特所著《灾害、脆弱性与环境正义》一书中提及的脆弱性的 18 个定义（1980-2005）^⑤的基础上，罗列了自 1981 年提莫曼至 2014 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的脆弱性定义，将文献研究的时间延伸到了 2014 年。最终，林冠慧、张长义将当代脆弱性的学术研究总结为五大内容：“包含实证主义的灾害风险分析（单向的灾害观点与人类能动性）、批判理论下的政治生态学（镶嵌在阶级与结构中的有限能动性）、弹性与适应性理论（能动性的演化适应与再组织）、人与环境整合性分析、多元论述主体”^⑥。此五点其实就是以研究的理论范式对卡特的三形态重新进行了区分。

^③①Carlo Pelanda. Disaster and Sociosystemic Vulnerability” Preliminary Paper. 68. University of Delaware Disaster Research Center. 1981. P. 5.

②Frederick C. Cuny, Disaster and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6 .

其实在林张的论文之前，日本首都大学的市古太郎就曾在一篇短文中谈到，脆弱性的研究拥有广泛的学科分野，诸如地震物理学、人类生态学、政治经济学、建构主义以及政治生态学，其共同点都在于灾害的研究。^①毋庸置疑，脆弱性概念的广范围使用无非是不同学科、不同理论范式对灾害的深入研究所触发的。

二、恢复力与灾害

恢复力的概念大致是 20 世纪 50 年代在心理学、精神病理学中开始出现，延续至今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化概念。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玛斯滕团队认为恢复力这一概念是“不平等的克服”（overcoming the odds）、“精神压力下的持续的能力”（sustained competence under stress）、“从创伤中恢复”（recovery from trauma）三个现象的表现。^②

恢复力在材料工学（material science）中被作为返回、弹跳使用，因此在中国也有学者如周永明先生将其译为“弹持能力”并用在社会科学研究中。^③生态学家霍林认为恢复力在 1973 年引入环境学，作为在环境变化中的生态体系特质的概念使用。^④自此以后，恢复力开始在各个学科里开始使用，也因此恢复力也存在着多样性的定义。1981 年提莫曼将其定义为“吸收及修复灾害事件发生的系统的能力”（“Capacity of a system to absorb and recover from the occurrence of a hazardous event”）^⑤。1996 年霍林与梅弗将其定义为：“恢复力的测定是在控制系统行为的变量及过程的改变系统改变其结构前可被吸收或容纳的混乱的大小规模”（“The measurement of resilience is the magnitude of disturbance that can be absorbed or accommodated before the system changes its structure by changing the variables and processes that control system behavior”）^⑥。同在 1996 年汉德墨、多弗斯称“系统如何对抗对于其操作环境主要的不安”为恢复力^⑦等等。在汶川 5·12 大地震发生之年，苏珊·卡特等人撰文非常明了地称恢复力（resilience）即是“应对灾害，恢复社会系统的能力”^⑧。

恢复力这一概念原来活跃在地域社会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领域、以及发展理论领域中，尤其是持续可能性（sustainability）的研究分析时，“Resilience”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2011 年东京大学家田仁曾将恢复力定义为“作为脆弱性相对概念，应该是内涵具有多义性的强韧性（toughness）”，而强韧性除了复原性以外尚有适应性（adaptability）、安定性（stability）、粘着性（cohesiveness）、顽强性（robustness）、宽容性（tolerance）、柔软性（flexibility）、多样性（diversity）。^⑨家田的多义性依旧停留在地域共同体的内部，因而遗失地域共同体与外部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尤其是在不同社会体制的国度，地域社会与周边社会、整体社会、乃至国家的联系。在强调地域社会自身的应对自然或其他灾害的恢复力的同时，地域外部的各种政策性的资源、力量的转移也不可轻视。21 世纪开始出现的共发式发展（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模式理念，已经证明了过于强调地域内部的内发式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是存在局限性的。^⑩

③W. I. Torry. “Natural Disaste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roduction.” Mass Emergencies4, 1979. P. 69-70.

④S. L. Cutter. “Vulnerability to Environmental Hazards.” Human Geography 20 (4): 1996. P. 529-539.

⑤Susan L. Cutter. Hazards, Vulnera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Routledge, 2006.

⑥林冠慧，张长义：《脆弱性研究的演变与当前发展》，《地理学报》2015 年第 77 期。

①[日]市古太郎：《Vulnerability と Resiliency に関するノート》，《地域安全学会 ニュースレター》2013 年第 82 期第 28 页。

②Masten. Ann S.; Best, Karin M., & Garmezy, Norman, Resilience and development: Contributions Form the study of children who overcome adversity.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Vol. 2. 1990. P. 425-444.

③周永明：《道路研究与‘路学’》，《二十一世纪》2018 年 8 月总第 120 期。

④C. S. Holling,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 Annual Review Ecological System., Vol. 4. 1973. P. 1-23.

⑤Peter. Timmerman. “Vulnerability, Resilience and the Collapse of Society: A Review of Models and Possible Climatic

1978 年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出版了一本介绍性的自然科学读物 Power of Nature，书中介绍了地震、火山、气候现象的形成原因及机制，正如其书名一样，该书中将地震、火山、气候变化都被归为地球环境中自然之力。^⑥地球的历史远远超过人类的历史，拥有 46 亿年历史的地球与从直立人露西（Lucy）算起的 350 万年人类历史根本就不具备可比性。这种自然的力量的体现对于后来形成的人类社会而言，因房屋、财产等的损失、人类肉体的伤害、死亡，以及对于幸存者的精神压力的实际显现，最终这些原本就是自然力量的体现，对于人类社会体系而言也就称为了灾害或者灾难了。佐藤武夫等人称“灾害是地震、台风等灾因与人类社会即被害对象两者相遇后才会发生。人类社会不存在的话，地震、台风也只不过仅仅是自然现象，因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地震、台风变成了灾害”^⑦。2012 年 4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行业标准》中将“自然灾害”定义为“以自然因素造成人类生命、财产、社会功能和生态环境等损害的事件或现象”，英文译词选用了“natural disaster”^⑧。

当脆弱性概念完全渗透进灾害研究后，国外的诸多研究依旧是将视角聚焦在微观的地域社会上，微观地域社会的复杂性也被认识到。前述的早稻田大学的浦野正树称：“微观水准的社会相互作用以及与其相关的研究手法，由于同等规模的灾害要因，其并不能明确的说明作为其结果在不同社会及社会中为什么会出现受灾规模的不同？”^⑨。在微观地域社会的分析上，德国基尔大学的灾害社会学者东布洛夫斯基通过德国北部雪灾事例的研究认为地域社会的民间组织、社会网络、社会连带（solidarity）的强弱与自然灾害的承受力相关。^⑩浦野正树在明确了脆弱性与地域社会集团内部的结合力、交流的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相关连，并且是受灾地域恢复的内部原动力，因此提出了只有将脆弱性·恢复力作为配置的一对概念，才可以发挥出有效性及意义来，这也可认作是对提莫曼论的具体深化。如图示 2 虽然可以将两个概念对置，但两者其实是互证关系。

Vulnerability	Resilience
抵抗 Resistance	恢复 Recovery
力量范围 Force bound	时间范围 Time bound
安全 Safty	弹回 Bounce back
减轻 Mitigation	适应 Adaptation
制度的 Institutional	基于共同体的 Community - based
体系 System	网络 Network
工程 Engineering	文化 Cultrue
产出 Outcome	过程 Process
标准 Standards	制度 Institution
Risk assessment 风险评估	Vulnerability and capacity analysis 脆弱性与能力分析

图 2 脆弱性与恢复力的对应性

三、灾后重建与“对口支援”

Applications.” Environmental Monograph No.1.1981.P.21.

⑥C. S. Holling and G. K. Meffe. “Command and control and the pathology of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Conservation Biology Vol 10, No. 2, April 17, 1996. P.330.

⑦J.W. Handmer, S. R. Dovers. “A typology of resilience: rethinking institu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ustrial & Environmental Crisis Quarterly, Vol. 9, No. 4, 1996. P.489.

⑧S. L. Cutter, L. Barnes M. L. Berry, “A place-based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resilience to natural disasters”.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 Vol. 18. No. 4.2008. P.598-606.

⑨[日]家田仁：《都市と地域システムの脆弱性と強靱性》，《都市計画》2011 年第 8 期。

⑩张曝：《地域社会与共发式发展（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阿坝师范学院学报》2017 年第 2 期。

1970 年美国灾害社会学学者克兰特利将自然灾害归类为“共识性危机”（consensus crisis），而将人为灾难归为“异议性危机”（dissensus crisis），共识性危机灾民及其他对于灾难的认知及解释以及救灾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大家都尽力于将危机、紧急状态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共同愿望。^⑤这也为“脆弱性”与“恢复力”这对概念赋予了社会心理学的意义。其实，在使用“脆弱性”与“恢复力”这对概念来分析、理解灾害、灾害救援、灾后重建时，尤其不能忘记这对概念的背后尚有错综复杂的各种要素的存在，诸如政治性、社会性、经济性组织性、法律条例性、技术性、环境性、生态性要素，这些要素相互纠缠、关系紧密，使得“脆弱性”与“恢复力”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样态。诸要素的协调将使得“脆弱性”减低，而“恢复力”增强。汶川 5·12 大地震的灾害救援以及其后的灾后重建正是诸要素在中国的社会体制下的政策性、计划性中获得了协调性，这种协调形成了一种合力，才使得举国体制的灾害救援与“对口支援”的灾后重建、重建后的长效机制取得了“汶川奇迹”，也才有了与世瞩目的“汶川模式”。其实，“汶川奇迹”及“汶川模式”也是对“脆弱性”与“恢复力”这对概念的实用性提出了挑战，也即是说这两个学界常用的概念并没有社会性的普遍意义。

“对口支援”（counterpart support）是中国社会制度中、政治生态中所生成的政策性模式，这在中国成为了常态性的政策。也是一种带有计划性、组织性的、也是有效性的技术、资金等资源的一对一性质的地理空间转移、重新配置，同时也是一种合作机制。因其计划性、组织性故而在中国也很有一段历史。1953 年 12 月 16 日《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社的决议》中明确提出要“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从这里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公有制成立后，中国在保障局部重工业发展的前提下，追求全国的地域间、各业种间（农、工、商）的相对均衡性的发展，这里其实体现的也是新的社会主义发展观。^⑥

2011 年国家行政学院学者钟开斌将中国的灾害对应的对口支援追溯到解放战争时期老解放区对被国民党封锁食物、生产原材料缺乏的新解放区的支援与帮助，并认为自彼时起形成了军队对地方、地方对地方的传统。新中国以后在应对自然灾害时，往往也以此传统形成动员力量支援灾区战胜灾害。^⑦钟开斌认为是在 1978 年的 11 月 11 日的《人民日报》上第一次出现了“对口支援”一词，但在其 2013 年另一篇论文中却更正为是在 1960 年 3 月 20 日《山西日报》的社论“厂厂包社对口支援一论工业支援农业技术改造的新形势”^⑧中。其实 1960 年的社论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的人民公社存在着密切关联，如果再深入挖掘文献，相信还会有新的材料出现。

对口支援政策也是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是紧密相关的。1979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11 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在《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繁荣的边疆巩固的边防而奋斗》的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加快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在增加资金和物资投入的基础上，组织内地省、市诸单位积极对口支援经济欠发达的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最终确定了北京支援内蒙古，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广西、新疆，山东支援青海，天津支援甘肃，上海支援云南、宁夏，全国支援西藏的方案。^⑨这些已经日程化的支援政策还在不断的得到强化，同时还会因为这些地区的一时性自然灾害的应对而进一步强化。

1976 年的唐山大地震，处在动乱恢复初期的中国也迅速启动了“对口支援”机制，在国力还不强盛的年代，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顺利并且较快地完成了唐山大地震的灾害救援及灾后重建。2008 年汶川 5·12 八级特大地震中，在积极进行灾害救援之

^⑤W. R. Gray, T. Loftin, T. Melham. Power of Natur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1978.

^⑥[日]佐藤武夫，奥田穰，高橋裕：《災害論》，東京：勁草書房，1979 年版，第 217 页。

^⑦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行业标准：自然灾害风险分级方法（Grading methods of natural disaster risk）》（MZ/T031-2012）。

^⑧[日]浦野正樹，大矢根淳，吉川忠寛：《復興コミュニティ論入門》，東京：弘文堂，2007 年版，第 31 页。

^⑨Wolf R. Dombrowsky. Solidarity during Snow-disast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 Vol. 1. 1983.

^⑩Quarantelli, Enrico. Emergent Accommodation Groups : Beyond Current Collective Behavior Typologies, In T. Shibutani (Ed.), Human Nature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Englewoods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0.

时，中国政府就已经决定了要举全国之力支援灾区恢复重建，并且特别制定、公布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2008年6月11日）。在《方案》中对口支援被具体化为“一省帮一重灾县”，按照国家的部署，东部和中部的19个省市每年以不低于GDP的1%，以三年为期展开，^⑥在援建期间，各援建方与被援建方都形成了长效的合作机制。

为了灾区尽快重建，为弥补资金的不足，中国发改委与财政部还紧急制定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利用国外优惠紧急贷款规划》，在获国务院批准后，向世界银行（World Bank）、亚洲开发银行 ADB（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欧洲投资银行 EIB（European Investment Bank）、法国开发署（Agence Francaise De Development）、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IFAD（The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贷款15亿美元用于重建。^⑦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的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组在2008年8月12日也及时发布了《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公开征求意见稿）》。汶川地震灾区的灾后重建总体规划的内容被具体化为重建基础、总体要求、空间布局、城乡住房、城镇建设、农村建设、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产业重建、防灾减灾、生态环境、精神家园、政策措施、重建资金和规划实施共计15项，全面覆盖了灾区地域社会的方方面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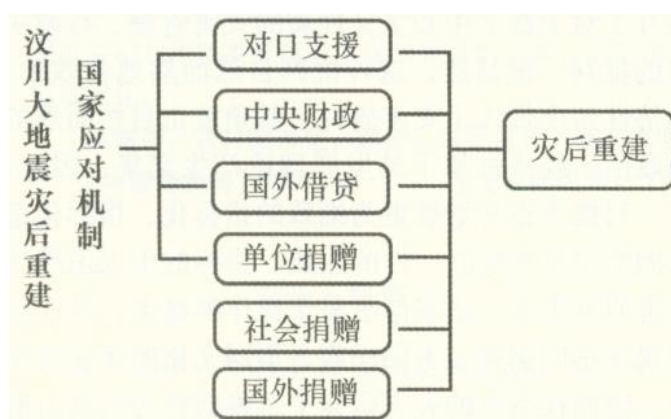


图3 汶川5·12大地震灾后重建与国家应对机制示意图（笔者作）

在汶川灾后重建中，对口模式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在2008年6月13日在国务院召开的中央与省市区负责人会议上，由国务院直接确定了各省市与受灾县市的“结对关系”，在“交钥匙”“交支票”援助模式上，将“输血”与“造血”相结合，逐步展开对受援方产业恢复提升的扶持。灾后不到半年，2010年8月15日上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市灾后重建指挥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和都江堰市人民政府共同签署了《关于构建上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市工作长效机制的框架协议》，同意通过多层次的合作交流机制，加强教育、医疗等援建项目后续运行管理保障，并且推进农业、商贸、旅游等领域全方位的多层次合作交流。如都江堰市自灾后引进了28家上海企业，投资总额达171.03亿元^⑧，投资额度超过了上海的灾后重建的援助额度。北京市也在完成了援建任务后，于2010年9月27日与什邡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北京-什邡2010-2013年合作框架协议》，确立了今后

^⑥①张曦：《地域社会与共发式发展（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阿坝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②钟开斌：《对口支援灾区：起源与形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研究》2011年第6期。

^③钟开斌：《对口支援：起源、形成及其演化》，《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④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国家民委民族政策文件选编（1979-1984）》，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242页。

^⑤对口支援的内容和方式主要包括：1）提供规划编制、建筑设计、专家咨询、工程建设监理等服务。2）建设和修复城乡居民住房。3）建设和修复学校、医院、广播电视、文化体育、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设施。4）建设和修复城乡道路、供（排）水、供气、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5）建设和修复农业、农村等基础设施。6）提供机械设备、器材工具、建筑材料等支持。选派师资和医务人员，人才培养、异地入学入托、劳务输入输出、农业科技等服务。7）按市场化运作方式，鼓励企业投资建厂、兴建商贸流通等市场服务设施，参与经营性基础设施建设。8）对口支援双方协商的其他内容。（国务院办公厅：《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人民日报》2008年6月19日）

重点合作、互利共赢合作等原则，合作领域包括教育、卫生、产业、农业技术、农副产品销售五个方面。“造血”功能的长效机制的强调其实也正是这几年在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中，总结出来的有效经验。“输血”“造血”极大的缓和了“脆弱性”，同时也增强了“恢复力”，尤其是长效机制中的“造血”更加提升了地域社会的“恢复力”。

四川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刘铁先生在其论文中对汶川灾后重建经验总结时称：对口支援模式已经“实现了从单边无偿支援到互利共赢合作的转变”是十分有道理的。然而在其结论中所言的“仅以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政治忠诚为激励要素显然不能构建长期的对口支援机制，更不可能将这一机制推广运用到更加广泛的扶贫与区域合作等领域。因此，应当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建立完善对于地方官员开展支援与合作的激励机制”^⑦却又背离了自己的认识。其实，长效合作所带来的长效双赢就是一种激励机制，也是主张地域社会内部与外部双赢的共发式发展理论在欧洲得到重视的根本所在。由此可以看到，地域社会中的“脆弱性”与“恢复力”会在中国的政治动员下，由地域外部的政策、资源、技术动员所覆盖，这种覆盖还会得到世界的人道性的、国内基于 56 个民族“命运共同体”认知的资金、物质的有效支持。因此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体制下、在经历过 40 年改革开放后国家社会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的中国，“脆弱性”与“恢复力”讨论的分析力是有限的。

四、结 语

脆弱性以及恢复力虽然在灾害研究中是一对热门词，由英国社会学家斯科特与马绍尔所编的《社会学词典》在 2005 年第三版中也未收入“Vulnerability”以及“resilience”两词，^⑧所收入的“risk”词条是以德国社会学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1986）为蓝本建构的。在“Disaster”一词前，该词再添上了“社会学侧面”（Sociological aspects of）一词加以限制。并以贝克（G. W. Baker）、查普曼（D. W. Chapman）的《灾害中的人与社会》（Man and Society in Disaster 1962）以及埃里克森（Kai Erikson）的《路径中的一切》（Everything in its Path 1976）为基础文献。而有关“Hazard”的词条则只有“Hazard Model”一条，基础文献采用了阿里森（P. D. Allison）的《事件历史分析》（Event History Analysis 1984）。由此可见在欧美主流的社会学词典并未关注灾害研究中热门的“Vulnerability”以及“resilience”这两个词。

2010 年柏林自由大学的灾害研究家洛伦茨曾称“Resilience”是“社会适应能力的定义是避免或抵御灾害的社会系统属性”（“Social resilience is defined as the social system property of avoiding or with standing Disasters”）。Social system property 这一表述中尚有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具有不同属性之意。^⑨故而在灾害研究中，受政治、经济、发展所操纵的“脆弱性”与“恢复力”这一对概念，过于追求普适性、同质性，从而忽略了人类社会的多元文化、多样社会属性乃至与不同的社会体制。其根本上尚留存着较为浓厚的人类中心主义、科学技术中心主义的色彩，同时也或多或少的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汶川 5.12 特大地震的灾后重建中所展现出来的奇迹性的重建经验、以及其后形成的长效性的合作机制都应该引发对这对概念的再思考。在汶川灾后重建中，中国东部及中部经 40 年改革开放，其积累的经济、技术资本迅速转换为外部强大社会资本进入西部灾区现场。这不能不说是政府机能正常且高效的运作。尽管中国在 2000 年就实施了西部大开发计划，国家也加大了投入，同样的对口支援也在新疆及西藏地区展开，然而西部与东部、中部的经济格差依然还大。

^⑦①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国外紧急贷款项目实施工作会议“汶川灾后重建借用 15 亿美元国外贷款”（《中国经济导报》2009 年 4 月 2 日第 A01 版）。

②“长效合作模式助力四川都江堰‘后重建时期’发展”，《中国政府门户网》
http://www.gov.cn/jrzq/2013-05/15/content_2403375.htm 2018 年 4 月 15 日访问。

③刘铁：《论对口支援长效机制的建立——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对口支援模式演变为视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 年第 6 期。

^⑧①John Scott and Gordon Marshall. The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②Daniel F. Lorenz. The diversity of resilience: contributions from 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 Nature Hazards. Vol. 67. May. 2013. P. 7.

20 世纪 80 年代，政治生态学角度的灾害研究展开了对于技术中心主义性质的灾害管理、行政决定的批判。很显然，这种批判自然而然地将政治、经济性角度带入了灾害研究。其角度也自然而然的与政治·经济框架下的发展理论产生交集，因此，这一对概念也开始被更为细致的指标化，指标化追求的结果是指标同一性的生成。指标的生成虽然为灾害研究带来了诸多似乎易于操作的概念，然而却忽视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多元复杂性。因而在当今的灾害研究中，脆弱性与回复力的概念中也多多少少渗入了西方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早稻田大学的浦野以“社会脆弱性”为视角对汶川大地震救援、灾后重建的担心也是如此。而剔除这些中心主义性质的认识才能清晰地寻找到灾害研究的、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政治、社会体制、文化传统不同的第三世界的灾害研究的真正方向。